

卢作孚“北碚模式”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城市变迁^①

张 瑾

(重庆医科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四川, 重庆, 630000)

摘要: 本文在大量翔实的资料研究基础上, 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视角, 利用档案文献、地方史志以及大众传媒资料, 从三个层面深入细致探究卢作孚“北碚模式”与 20 世纪 2、30 年代重庆城市社会生活之关系, 为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提供一个内陆个案。文章分三部分: 第一, 展示 20 世纪 2、30 年代中国内陆最大的开埠口岸重庆城市生活变迁实况, 这是一个竭力模仿上海的内陆“小上海”。“军人干政”的封闭体制无法抗拒来自“上海模式”的冲击, 但军人政权的各项变革, 均以维护防区体制为目标; 第二, 研究卢作孚和他的“北碚模式”实践。“军人干政”体制内衍生出的另类现代生活——“北碚模式”, 在相当程度上“辐射”重庆, 成为这个封闭世界与外界交往的重要窗口。第三, 总结 20 世纪 2、30 年代军人统治下的重庆城市生活呈现出浓厚的新旧杂存的转型特征, 以“小上海”为荣的重庆大有被卢作孚规划的“北碚模式”取代的势头。

关键词: 卢作孚; 北碚模式; 重庆; 近代中国城市史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重庆经历了一个畸形的、不充分的早期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军人干政”^②的体制下展开的, 不仅异常缓慢, 且十分艰辛。在这个“军权高于一切”^③的城市, “外部现代性的冲击”促使军人们为“摆脱自己的落后的状态, 消除外部的威胁”而变革。这种“体制内”的“被动”响应, 客观上也为重庆城市现代化的起步奠定了基础。在封闭的重庆, “现代化”成为了一种既合法又时髦的话题。对上海摩登的追逐, 赋予了这个军人的城市一些改革进取的精神。其结果, 不仅获得“军人干政”的合法性资源, 也使得整个社会弥漫一种“小上海”的自满。最早打破这个僵局的是卢作孚的现代化实践。

研究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庆, 不能不讨论重庆的郊区——北碚的变化, 以及带给重庆的影响。重庆和北碚的建设, 是在两个迥然不同的建设理念下进行的。军人市长潘文华管理的重庆被“小上海”的赞誉所笼罩, 而卢作孚在 21 军防区内的现代化实践却使北碚很快超越了地域的局限, 甚至迅速走向了全国, 乃至世界。当北碚的建设模式为外部世界认同时, 这样的生活也影响了“大都市”重庆, 以及重庆周边的乡村。

一、军人的大重庆

在那个都以上海为榜样的时代, 如果一个城市有“小上海”的称谓, 便是十分的“得意”, 因为“小上海者, 规模略小而雏形全备之上海是也”, 有“像上海”一样的洋楼、饭店, 便是有了建设。^④与此同时, “管理了这地方的权威者和被管理的那一些包括于其中的群众,

^①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美国“The Urban China Research Network New Faculty Small Grant Program: History and Reality: research on the inland city Chongqing”研究成果之一。

^② 有关刘湘时期重庆“军人干政”的研究, 参见拙著《权力、冲突与变革: 1926-1937 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 重庆出版社 2003 年 4 月出版。

^③ 依附军人是重庆社会的一大奇观, “许多报馆主笔或学校校长, 卡片上都冠以军部的谘议或顾问等等头衔。”(杜重远:《狱中杂记》, 上海生活书店, 1936 年版, 第 183 页。)防区政治体制下, 不仅军人地位显赫, 与军人有关系的人也成为“特殊阶层”。所谓“在朝在野之演政治者, 因环境的关系, 无不多少与各军有关联。”(前溪:《蜀游杂记》,《国闻周报》第 12 卷 26 期)

^④ 金满成:《重庆的前途, 上海的后影》,《新蜀报副刊》第 35 期(1932 年 6 月 20 日)。

谁不曾梦想有一个新的都市出现？管理者利用了这新都市的建设的名义，于是捐款，货税，印花税之外，还来发行彩票以取尽民众最后一滴血汗。群众为了梦想这新都市的引诱，所以把种种负担加重起来，好像也还愿意支持。”^①潘文华^②时代的重庆城市建设正是在这样的理念笼罩之下进行的。

20年代末重庆的建市是“上海模式”^③冲击的结果，也是重庆迈向现代意义都市的开端。“上海模式”的巨大辐射效应，使其渗透内陆，介入、打破重庆城市传统社会的自然演化的逻辑发展进程。30年代重庆城市建设开始以“上海模式”为主要参照系。潘文华说，“欲唤起人民之注意，先有一种事实之表现，其它精神建设不易见功，不如从物质方面亟急开动，较易新人耳目”。^④1927年9月，重庆商埠督办呈请川康边务督办公署将商埠督办改为重庆市，理由是“上海、南京、广州、杭州等商埠地方，均先后改市，成绩昭然”，^⑤以求与沿海城市的市政模式“划一”而设市。重庆市政组织结构也主要参照上海、南京、杭州的城市组织规则，制定出《重庆特别市暂行条例》。

新市区比拟上海等特别市规格开辟。1934年10月，市政府特委前江北县长侯烈武“驰赴汉沪各市，实地考察”，“以资借鉴”。^⑥军人政权介入城市建设，在客观上推动了整个社会对“上海模式”的广泛认同。1928年底，各法团机关“上书政府，为民请命”，“转请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依顺舆情，准照特别市组织法第三条第三项，确定重庆为特别市”。^⑦1934年春，留美归来的上海著名建筑师钱少平考察重庆，提出市区、交通、码头等城市整体规划模仿南京、上海的整体设计构想，并预言，如果照此计划，“则将来之重庆市定与纽约上海并驾齐驱”。^⑧

30年代初，在成功实现四川军阀内部整合以后，刘湘更加热心城市建设。^⑨1935年参谋团入川，重庆开始获得与全国政治、经济同步发展的条件。南京中央政府以政治整合带动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也为缩小重庆与“上海模式”的差距创造了机会。1936年10月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成立，用刘湘的话说，这是建设新四川的奠基典礼。^⑩

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重庆城市景观有了空前的改观，于是，“下江人”¹¹关于重庆的话语充满了“摩登”，“现代”等词汇。“小上海”、“沪汉之风”、“建筑颇似香港”是描述重庆现代景观的典型话语。¹²重庆最好的莎利文饭店，简直不比上海的国际大饭店逊色。^⑪抗

^① 金满成：《重庆的前途，上海的后影》，《新蜀报副刊》第49期，1932年7月7日。

^② 潘文华（1888-1951），四川仁寿人，四川速成学堂毕业生。1920年任刘湘部师长，因曾“有改革重庆之议”，1926年被刘湘委任为重庆商埠督办。1927年11月，督办公署改为市政厅，潘文华由督办任市长，直至1935年7月因南京国民政府严禁“军人干政”而辞职。

^③ 关于“上海模式”的思考，见拙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④ 《九年来之重庆市政》，重庆，1936年10月出版，第1编总纲。

^⑤ 《重庆商埠月刊》第9期，1927年8月。

^⑥ 《市政府实施新政》，《商务日报》，1934年10月15日。

^⑦ 《致全国商会陈请书》（1928年11月13日），石荣廷，李奎安：《四川重庆各法团机关李石两代表请愿记录》，上海蜀评社，1928年12月，第31-32页。

^⑧ 《商务日报》，1934年3月17日。

^⑨ 1933年“中国科学社第18届年会”在北碚召开，刘湘不仅热情接待科学社理事专家，负责全部入川费用，并与到达重庆的科学家们“畅谈四川建设规划”。《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纪事》，《科学》第18卷第1期。

^⑩ 据吴相湘著《晏阳初传》，1935年秋，蒋介石电促晏阳初迅速将平民教育乡村改造工作推行于四川。刘湘积极与晏阳初往来函电研讨，邀请晏阳初协助四川省建设，表现出相当的诚意。

¹¹ 笔者将“下江人”的概念引入民国重庆城市史的研究领域是受美国学者Lee McIsaac对抗战时期重庆“下江工人”研究的启发。到目前为止，Lee是第一个从学术领域关注“下江人”的学者。笔者对Lee曾给予的启示表示诚挚谢意。关于“下江人”与民国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参见拙文《民国时期“下江人”的形成与认同刍议》，《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¹² 参见葛绥成：《四川之行》（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刑长铭：《巴县及重庆实习调查日记》，肖铮主编，《民国二十年大陆土地问题资料》139；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广州中华书局1937版）；

战爆发后，重庆的“柏油马路，四五层的立体式大厦，影院，剧场，咖啡室，西餐社，油壁辉煌的汽车，和闪烁光芒的霓虹灯，凡都市所有者，无不应有尽有”。^②

西方人称赞重庆“正在沿着时代的步伐前进”^③，说重庆的建设是“按照现代结构”进行的。^④但，人为地将一种异质性因素——“上海模式”引入既有的社会结构之中，其运作条件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其结果则有明显的差异。即为急于缩小与上海的差距，一切举措不得不在超常规上进行，致使30年代的重庆城市“现代”景观有着浓厚的人为刻意制造的上海风味。当“下江人”看到市区中央公园内的“涨秋”西餐室的装修得几乎与上海的大餐馆一样富丽堂皇时，尖锐地批评道：“四川人各事善模仿外间，都市繁荣，虚有其表”。^⑤对于重庆的“现代化”，陈衡哲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⑥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化“畸变”现象。^⑦

无论如何，30年代，重庆人的生活中多了许多“现代”的词汇。城市公用事业和现代设施的词汇频频冲击着市民的感官，电灯、电扇、电话、自来水与百姓生活联系起来，尽管市民不习惯使用自来水……但是，生活的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代化路灯”也“由沪专轮抵渝”。^⑧当飞机的到来打破了连接重庆与外界的“黄金水道”的独霸地位后，《商务日报》等大众传媒将乘坐飞机的“时尚”用醒目的新闻标题来报道重庆军政商界乘坐飞机往来于重庆、成都和下江地区；都市传媒公布每日进出重庆的飞机航班、轮船和汽车的时刻表。自重庆与成都航空开通后，“凡成渝间往来之军政商学各界，多乘该线飞机去来”，“航空邮件，亦逐渐增多，以致由渝飞省者，非先期购票不可，经营之发达，由此可见”^⑨。现代交通工具，如轮船、汽车、飞机等进入重庆人的日常词汇。文艺作品中也是新鲜事物不断，且处处以上海为时尚。

从“下江”回来的川人热心“创办舆论机关，把外面的新思潮，介绍到我们那闭塞的四川里面去”^⑩。市民们已不满足一般的新闻，他们开始追求具有休闲意义的副刊，当然免不了出现读者与编者的讨论，因为读者群有了不同的口味。重庆的大报，如《新蜀报》和《商务日报》也以上海为时尚，逐渐形成了各自的风格。《新蜀报》关心时事，揭露社会阴暗面，深得知识分子的喜爱，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军阀政治下的渴望自由的呼声。从上海归来的编辑金满成主持的《新蜀报》副刊极具特色，显示了重庆社会所经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社会的矛盾。《新蜀报》副刊逐渐形成“酸辣、幽默，富于刺激性”的风格。副刊拥有了固定的读者群，形成了市民参与“讨论”的“一种空气”。^⑪《新蜀报》还是军阀刘湘统治时期对共产

庄泽宣：《陇蜀之游》，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1年版），69辑。

^① 陈衡哲：《四川之行》（一），《独立评论》第190卷，1936年3月1日出版，第18页。

^② 吴济生：《新都见闻录》，上海光明书局1940年版，第15页。

^③ Dryden Linsley Phelps, “Through The Sandalwood Door”, in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April 1936): 18. “Field Gleanings: Chungking”, in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December 1930): 32. “Chungking Jottings”, in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June 1931): 40. “Medical Reports From Treat Ports Chungking,” in *The China Yearbook*, (1925-1926): 451. “Chungking News”, in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January 1929): 27.

^④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d., “Briefs on Selected PRC Cities, Chungk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November, 1975), p.3. 另参见J.E. Spencer, “Changing Chungking, The Rebuild of An Old Chinese City,” in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29 (1939), pp. 47-50.

^⑤ 陈友琴：《川游漫记》，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版，第34页。

^⑥ 陈衡哲说，重庆美丰银行宿舍房间一切设备，从衣柜到浴盆，都是国外最近流行式样，可惜侍者们却缺乏现代化的训练，她感叹“现代化的精神”没有“加到那现代化的房间与家具中去”。黄炎培先生游历重庆期间，对重庆的“现代”景观颇不以为然，这与他高度赞扬卢作孚的北碚建设反差极大。

^⑦ 参见孙立平，《后进生发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217页。

^⑧ 《时代化路灯大批抵渝》，《商务日报》1935年5月24日。

^⑨ 《渝蓉航空将换新飞机》，《商务日报》1934年4月15日。

^⑩ 《蜀评》第2期，第57、58页，1925年1月1日上海蜀评社出版。

^⑪ 杨凤恩：《重庆的报纸与杂志——不是介绍，不是批评》，《现代读物》第11卷第23期，第41页，重庆。

主义思想有大胆而较为正面披露的报刊，在某种程度上将革命的话语当作时髦思潮传播。

而重庆市商会主办的大报《商务日报》，则深谙军阀政治“环境”的险恶，其生存方式乃远离政治，提出“纯粹以读者的利益为利益”，“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不受任何政治影响，不为任私人利用”，“本报愿意永远是民众的”^①等口号；同时，仿照“京沪”式副刊、广告制作^②，逐渐形成一种逃避社会现实的“风格”，代表了重庆城市相当一部分市民的心态，即：不关心外部的世界，只是沉醉于都市奢靡的生活之中^③。《商务日报》传播都市时尚信息，为都市女性和新兴白领和“小市民”所钟爱。围绕《商务日报副刊》，逐渐形成“小市民”读者群。《商务日报》以“尽力向着通俗化的方向”作为办报方针^④表明这一群体的逐渐壮大和城市商业化的取向。由于《商务日报》“以副刊为招徕雇主的东西，故不惜登载低级趣味的作品，以迎合能够订报的读者”^⑤，引发了一场《商务日报》是否应该为“小市民”服务的讨论。^⑥总体上看，大众传媒推动了重庆人追逐时尚的生活态度，追求上海式的“摩登”被传媒不断的放大。

大众传媒具有对人的现代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新闻、舆论到时髦风尚和时髦货，传播工具及时报道社会事件和社会变化。它们提供了人们绝对不可能用别的方法看到的角色模式和生活方式掠影”。^⑦广告是民国时期重庆城市文化商业化最明显的标志。作为一种以文化为载体，以经济为目的的现代社会的产物，广告最典型地反映出文化与商业的结合并为商业服务的性质。我们以《商务日报》和《新蜀报》的商业广告为例，从广告数量，所占据的版面，以及广告的类型，都十分接近同一时期上海传媒的广告。^⑧

进入 30 年代，重庆市民的消费观念开始向着上海摩登看齐，重庆人开始创造出一种畸形的生活方式，时人批评重庆是“拜金主义”的地方^⑨。烫发是 2、30 年代重庆都市时髦女性^⑩的象征。新式的理发店出现了，装饰不仅“极新式”，且“坐则有弹簧睡椅，刀具多系舶来品”。即使价格不菲，“每日顾客，非常踊跃”。¹¹全市设备齐全规模大的“西式”理发店有 50 余家，其中以‘士威士’、‘美以美’、‘一乐也’为著名，电器烫发需要 30 元。¹²市风崇尚“奢侈”，都市消费的“奢风日炽”，“俨为上海之第二”。豪华的理发馆不仅聘请江浙技师，且资本也多半来自“下江人”。66 元享受一次“下江人”理发技术的时尚在 30 年代中期也出现了。¹³

都市的繁华生活，对周边农村青年诱惑大。一位家住合川县城的青年，从父亲在重庆做生意而知道重庆的繁华，“尤其是父亲（合川县的一个商人），每次他贩米到重庆去了归来时，

^①《本报廿周年纪念会纪》，《商务日报》1934 年 4 月 27 日。

^②《重庆商务日报十二周年纪念特刊》，重庆，1926 年版，第 11 页。

^③在回答读者对商副的漫画批评时，编者指出：“环境不容尽量画——虽然画的题材容易，我们有时也会想到一些特出的，然而，实际上，读者们想必也曾知道我们是在怎样的一个底下，为保全我们报纸的生命计，有时很好的题材，我们也必得割爱”，编者：《论漫画之难——答喋喋君》，《商务日报》1934 年 8 月 6 日。

^④《编者白》，《商务日报》1935 年 6 月 4 日。

^⑤质之：《投入意见箱》，《商务日报》1935 年 4 月 2 日。

^⑥镜枝：《对于商副的意见》，《商务日报》1935 年 2 月 17 日。

^⑦（美）罗伯逊著，黄育馥译：《社会学》（上）第 161 页，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⑧参见 1929 年 11 月 27 日、28 日《新蜀报》广告，以及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12 月版，第 439 页。

^⑨《我个人想提出来讨论的几个重大问题》，《商务日报》1931 年 6 月 28 日。

^⑩据 2、30 年代发表于重庆新蜀报副刊的文艺小说，时髦女性和摩登女郎多半与知识女性（学生）或风尘女子有关。在重庆的方言中“新式女子称摩登”（黄克明编著《新重庆》第 71 页，1943 年 1 月新重庆编辑社出版），这些“新式女子”中，有军人的太太们，也有学校的女学生。参见《山城：太太疯》，《商务日报·副刊》第 67 期，1935 年 2 月 20 日，及这一时期《新蜀报副刊》小说。

¹¹《重庆之理发工人概况》，《四川月报》第 3 卷第 2 期，1933 年 7 月，第 119 页，重庆。

¹²《重庆市之理发店》，《四川月报》第 4 卷 3 期，1934 年 2 月出版，第 132 页，重庆。

¹³《商务日报》1934 年 9 月 9 日。

总带着不少本地方不能买到的东西给我使用，令我对于那些难得的东西，发生爱恋，同时对于何以能够卖出那些特别的东西来的重庆城，更起了无限的幻想，兼之从父亲的闲谈中，又听说重庆是怎样的一个大城市，商埠如何的奢华美丽，有许多鲜见鲜闻的事务，足以令人惊异叹绝……”^①。

2、30年代，上海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领导时装、时髦新潮流的中心城市，其商业文化的辐射力轻易的到达了内陆的重庆。20年代中期开始，市区开始出现奇装异服的“摩登妇女”。各种针对时代女性的服装广告也以“风行申杭”^②为号召，将追逐上海“摩登”的社会时尚推波助澜。追求新奇流行服饰的女性一为有钱阶层或军人的姨太太，二则是学生群体。在最繁华的上半城绸布庄店“以售上海花色为多”^③。为端正“市风”，21军三令五申禁止新潮女性以异服奇装“招摇过市，而出其摩登风头”。甚至采取不得不动用军警在市区各主要繁华街道，“用剪刀剪”的方式，对付“露肘裸膝”的时髦女性，“被处罚者，平均每天至少在百人以上”，一时间，这些街道被“摩登女子，均视为畏途”，女学生们也纷纷“改装”，给裁缝们带来了不少生意。^④

这一时期的上海“摩登先生”的标准装束是：“头戴铜盆帽（礼帽），手拿司的克（手杖），眼戴金丝眼镜，蓄西式小胡子，口叼雪茄，挟一皮包，西装革履”^⑤，而同一时期的重庆《商务日报》的漫画中的时髦男女形象已与“上海摩登”十分接近。^⑥衣食住行之首的服装，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市民的身份地位。尤其是当新型职业出现以后，重庆市民的服饰已经将人群划分为不同层次的阶层了。模仿上海摩登的都市新兴阶层的出现是重庆商业文化逐步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⑦

新兴的“白领”成为城市新的阶层。^⑧重庆大学作为重庆唯一的大学，学校的规模逐渐壮大。1935年重庆大学在校学生约200人，同年数学系、化学系、应化系、机械系、采矿系毕业学生约有50余人。这一年，重庆大学新聘的教师中，有留美、法国、日本的在沿海工作的教授，以及国内的讲师。^⑨1936年末，沙坪坝因为学校的集中而被认为是重庆“理想的文化区”。^⑩

30年代重庆城市商业化的氛围¹¹，让“下江人”十分吃惊。这个西部中国的大商埠，不

^① 然然：《如此江洲》第1集上册，上海印书馆发行，1930年10月初版，第8页。

^② 《商务日报》1934年4月1日。

^③ 陆思红：《新重庆》，中华书局，1939年8月版，第180页。

^④ 《商务日报》1934年5月27日。

^⑤ 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365页。

^⑥ 刘残音：《重庆通信箱汇刊》第1集，重庆商务日报编辑部，1937年11月版，第79页。重庆的中产阶级，如编辑、律师等城市白领群体更是对上海摩登亦步亦趋，休闲消费的去向往往是咖啡馆，西餐馆等处，“着花毛呢单衫，鼻驾克罗米眼镜”

^⑦ 30年代初期以后，《商务日报》逐渐开辟了“漫画”专栏，其中反映重庆都市生活时尚的内容占绝大多数，从婚姻、择偶、“现代”生活方式、服装等。《如本市女子设计之最新服装》，《商务日报》1934年5月24日。

^⑧ 所谓的“自由职业者”，包括学校教师、医师、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等。“四川随社会文明之进步，新的自由职业份子，逐年加多”，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46页。参见《商务日报》1935年6月15日、1935年6月23日。实际上，直至1937年，据重庆职业人口百分比统计，在全市273251人口中，自由职业2.14%。参见《商务日报》1935年6月15日、1935年6月23日。四川省政府秘书处编：《四川统计月刊》第1卷1期，第7页，1939年1月出版。另外，1927年以后，重庆出现职业女性，在市政府和军事机关任科员、书记、录事、办事员、见习生、参议、干事等职，每月薪金从20—60元不等，为全市职业女性中生活最优越者，据统计全市有此职业者合计50余人。

^⑨ 《重庆大学近讯》，《四川月报》第7卷第3期，第231页，1935年9月出版。《重庆市之女子职业》，《四川月报》第5卷5期第187—188页，1934年11月。

^⑩ 《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四川月报》第1卷第1期，1937年1月出版，第248-253页。

¹¹ 关于重庆商业贸易的繁荣，参见舒心诚：《蜀游心影》，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37页。曹亚伯：《游川日记》，1929年上海中国旅行社编辑发行，第29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编《旅川须知》，1924

仅是各种土货洋货充斥商号，而且“娱乐的歌舞电影场，和汽车中鲜艳夺目的女人，差不多可比上海的洋场，这却不能不使人惊异。离海这么远的地方，有这么长足的进步！”^①虽然重庆还没有像上海“大世界”、“新世界”那样大型的游艺场^②，不过集饮食、娱乐于一体的大型娱乐场所已经出现。^③还有第一流的电影院如国泰^④、新川，“专映舶来片”，各大报每日均有电影、戏曲的广告。重庆最新式的大厦——俱乐部，里面的装修，完全仿照世界各处俱乐部的方式，……“洋化的跳舞场”，还有青年女子充当舞伴。^⑤

重庆的婚俗也有了较大的变迁，“近来多用新式结婚礼，各种旧习已有改易”。^⑥“自由结婚离婚之风气，逐渐普遍，已形成社会重要内容”^⑦。追求时尚的青年还利用现代传媒征婚。择偶的标准，除了年龄、健康和嗜好外，还要求男方“能通英法语言”，“国学最低需要具高中以上之程度”^⑧。文艺作品中也表现了经过现代教育的青年反抗家长包办婚姻的举动。^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的生活是相对“稳定”的，但重庆人的“小上海”日子却过得十分艰辛和矛盾。^⑩这一时期，重庆城市的流民^⑪众多，已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潘文华在任九年，重庆市政府力所能及地建立起初步的社会救济机构，以缓解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⑫但事实上重庆始终无法摆脱“难民庇护所”的命运。^⑬据重庆市警察局统计，因严重的旱灾，仅 1935 年的 2、3 月份，在重庆市区街头饿死或冻死的达 3800 人。^⑭周边乡村的女性涌入重庆沦为妓女，“乡村的女儿们，受不了经济崩溃的打击，成群结队地奔投都市，操着肉粉生涯的地狱生活，也是铁一般的事实”。^⑮另据民食平价委员会 1936 年 7 月调查，

年版，第 34 页

^① 黄九如编：《中国十大名城游记》，上海中华书局，1935 年 6 月第 1 版，1941 年 3 月第 3 版，第 106 页。

^② 吴济生：《新都见闻录》，上海光明书局，1940 年 1 月版，第 148 页。

^③ 广告：《陶园——重庆最高尚完备之交际娱乐场所》，唐幼峰编著：《重庆旅行指南》，重庆书店发行，1933 年出版。

^④ 国泰大戏院“内部可容 1400 人，设备堂皇，布置雅丽，选映之片，多为中外名贵出品”

^⑤ (美) 贝西尔著，钱士，汪宏声译：《美国医生看旧重庆》，第 222-223 页，重庆出版社 1989 年。

^⑥ 重庆市政府秘书处编《重庆市一览》，1936 年 1 月出版，第 98 页。有“小重庆”之称的合川，在新的观念冲击下，结婚十年的夫妻也登报离婚，第一条理由便是“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在夫妻“感情破碎”的情况下，协商离婚。《我的离婚启事》，《嘉陵江日报》1930 年 8 月 9 日。30 年代初，重庆的离婚案“逐月有加无已”，《商务日报》1931 年 5 月 5 日。

^⑦ 《嘉陵江日报》1931 年 3 月 10 日。

^⑧ 《商务日报》1931 年 5 月 13 日。

^⑨ 秋鸣：《逃亡》，这篇小说反映了一个重庆周边的乡村的一个“中产的家庭”中发生的事情。家长是一个“年近五十的腐旧不堪的老头子”，他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儿，因为进入了“洋”学堂，受到现代知识的教育，居然要追求自由的恋爱，提出“要做一个时代的新女性，恋爱，只要是纯洁专一的，不是乱爱，也没有什么败坏门风，对于婚姻，那是女儿的终身大事，不需要父母代劳，女儿有眼睛，会自去选择理想的丈夫的”。这些话语震惊了周围的人们。为反抗父亲包办婚姻，她与男友一道逃离家乡，目标是去“繁华的”大上海，最终他们乘坐的开往上海的轮船失事，双双葬身江中。这个悲剧的结尾象征在封建思想浓厚的重庆，反抗包办婚姻的艰难。载《现代读物》第 9 卷第 20 期，第 72-77 页，1936 年 9 月 15 日出版，重庆。

^⑩ 1926-1937 年，刘湘统治时期，重庆城区基本没受到军阀混战战火的侵扰，但城市经济却不得不为 21 军庞大的军费开支付出沉重的代价。

^⑪ 据池子华著《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 3 页），流民是指丧失土地而无所依归的农民；因饥荒岁月或兵灾而流亡他乡的农民；四处求乞的农民；因自然经济解体的推力和城市近代化的吸引力而（盲目）流入城市谋生的农民，尽管他们有的可能还保有小块土地。从重庆的状况看，通常所谓“难民”正是由上述的周边农民组成。

^⑫ 参见《九年来之重庆市政》、《四川月报》等。重庆市政府救济举措有设立大规模救济院，议决“禁止乞丐入境案”，“路尸掩埋案”，并根据实际情况，增设“贫民收容所”、“贫民工厂”和“女子工读社”。

^⑬ 《九年来之重庆市政》，重庆，1936 年版，第 128 页。

^⑭ 《四川月报》第 10 卷第 3 期，1937 年 3 月出版，第 278 页。

^⑮ 《本市的乐女调查》，《商务日报》1934 年 3 月 4 日。

重庆市区贫民，共有 244195 人，占全市人口三分之二强。^①重庆的难民潮持续到全面抗战爆发。^②

重庆的繁荣是畸形的，都市的繁华与周边乡村的贫穷反差极大。董时进在《四川人应常到外面考察》演讲中指出，从重庆方面来看，高楼大厦，商号上充满了都是奢侈品；男女们所着的都特别奢侈。要知道：那些奢侈品大多数都是从外国来的。但是一出城门，看看那些乡下的老百姓，愈是比从前简陋；衣食住大多数不如从前了。……要使城市底文明渐渐输入到乡村去，使其有大概的平衡趋势，不至于各走极端，相差太为悬殊。^③

重庆人还嗜好吸食鸦片。“随处有面黄肌瘦的瘾君子出现”，这些人“衣不蔽体，食不充饥，而青脸长发，酷似城隍庙中的鬼卒”。^④美国人吉尔门在《四川游记》中写道：“无论城市或乡村之人，凡被余询问者，均称吸烟人数约占全人口百分之五十。此等吸烟者之中，百分之七十为成年人。”^⑤鸦片成为城镇居民的主要嗜好和大宗消费，如巴县（1926 年）81 集镇，有各类烟馆 430 余家，平均每场有 5 家，每家有烟灯 6 盏。^⑥30 年代初，重庆有上、中、下三等鸦片烟馆 1600 家，额定烟灯数量达 3197 盏。强行送往诊所治疗的鸦片吸食者的消息随处可见。^⑦重庆有“烟灯比路灯多”的记载。1935 年 5 月，重庆的文学月刊《山城月刊》创刊，提出该刊的宗旨竟是“使读者在茶余酒后，或公暇睡前，有一件比吸鸦片稍好的消遣。”^⑧美国记者白修德这样描写抗战前的重庆：“城市里弥漫着鸦片气息。霍乱，痢疾，梅毒和沙眼，腐蚀着人民的健康。工业是几乎不存在的，教育是原始的”。^⑨

30 年代后期，重庆与外界的“内外隔膜，仍未化解”，有人指出，“闭关自守，不通空气的四川，直到今日，还是和二十年前一样”。^⑩这个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显得异常的步履蹒跚。在坚硬的封建残余内壳，现代性要素成长缓慢，制约着重庆人开放意识的成长。辛亥以后四川军阀战乱不断，封闭自治的军阀心态笼罩着整个四川，从当局到平民几乎没有思考现代化的动力和空间。

二、现代精英与“北碚模式”¹¹的凸现

杜重远称赞卢作孚是“川中之人杰”，^①这是 30 年代外省人对卢作孚的典型话语。^②卢

^①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 年版，Y1。

^② 1936—1937 年间，重庆城市人口中除少部分系“‘下江人’来渝的人士和眷属”，绝大部分乃是“和内地壮农抛弃旧业，跑向都市来另求生路的”农民。见吴济生，《新都见闻录》，上海光明书局，1940 年版，第 119-120 页。

^③ 见《嘉陵江日报》，1932 年 1 月 12 日。另 30 年代中期，《商务日报》一组漫画生动再现重庆城市生活的两极分化的景观。另，有关重庆的游记也真实记载了城乡生活实况，如薛绍铭著《黔滇川旅行记》。

^④ 杜重远：《狱中杂记》第 183 页，上海书店 1936 年出版。

^⑤ 《四川月报》第 3 卷 5 期，1933 年。

^⑥ 四川省档案馆藏 1926 年巴县各场烟馆登记征费册，转引自秦和平：《二三十年代鸦片与四川城镇税捐关系之认识》，《城市史研究》第 19-20 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年版，第 80-81 页。

^⑦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August 22, 1936): 416

^⑧ 《山城人语》，《山城月刊》创刊号，1935 年 5 月 5 日重庆出版。

^⑨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端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 年版，第 4、5 页。

^⑩ 杨若瑜，《纪念辞》、《本刊一年来之经过》，《现代读物一周年特大号》（1937 年 1 月 1 日，重庆）

¹¹ 在卢作孚的话语中，与“北碚模式”最接近的概念可能是他论及将嘉陵江三峡的乡村“布置经营成一现代乡镇的模式”（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笔者关于“北碚模式”的思考受到了民生实业有限公司研究室兼职研究员、重庆作家赵晓铃女士的启发。西南师范大学刘重来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民国时期卢作孚乡村建设”从学术上首次对北碚进行系统研究。刘教授指出，北碚的道路是“乡村现代化”的道路。（参见刘重来：《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造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凌耀伦、周永林编：《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笔者以为，就现代化理论而言，“北碚模式”的提法不失为一个具有量化标准的研究内陆地区现代化的概念。相对于同时代先进的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而言，卢作孚在北碚的建设颇具独创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北碚的建设超越了乡村建设的内涵，成为研究内陆中国现代化的特殊个案。

作孚颇有“追逐现代或更超现代”勇气的地方精英，其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是“现代化”思想^①。现代化思想也贯穿了卢作孚一生的实践，使他成为重庆城市现代化的“最早呼唤者”。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城的一个农民兼小商人之家。合川，有“小重庆”之称的嘉陵江上的重要城镇，是重庆城市经济文化的直接辐射区域。青年的卢作孚正是成长在激烈动荡的时代。1908年，卢作孚到成都的一所补习学校专攻数学，开始了他的自学生涯。青年卢作孚对西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认真研读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近代西方名著，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他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学说的影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卢作孚自然积极投入革命运动。^②

1914年秋，卢作孚乘“蜀通”轮去上海，这是他第一次通过“黄金水道”出川。在上海，他结识了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深受其“教育救国”思想的启迪。^③同年底，卢作孚到北京，对国内政局的颇有感触。“五四”以后，卢作孚应邀任成都宣传新文化的主阵地《川报》的编辑、主笔和记者，同年接任《川报》社长。其间他与天津《大公报》，北平《晨报》和上海《申报》建立了联系。^④1920年卢作孚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卢作孚被杨森聘为永宁道教育科长，在川南推行通俗教育活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德熙和恽代英也参与了卢作孚的试验，提倡放脚，剪辫，男女同学读书，讲清洁卫生等移风易俗的活动，影响遍及全川。四川军阀混战中断了他的理想。卢作孚第二次出川，到江浙考察，这次，除了考察教育，还考察了“寓兵于工”的事业。^⑤1924年，热衷于“教育救国”的卢作孚开始了他的“第一个实验”——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仅仅一年半时间，这一实验在军阀混战中夭折。

1925年10月，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为宗旨的民生公司应运而生。民生公司是卢作孚追求现代化的载体，显示出内陆人追求现代事业的心路历程。^⑥这个西部中国崭新的现代企业所蕴涵的现代理念远远超越了经济现代化的范畴，为卢作孚的现代化思想作了最好的诠释。卢作孚“实业救国”的中心内容便是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卢作孚的《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的统一》一文，明确地使用了“现代化”的概念。而《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则系统阐释其现代化思想。从1934年到1936年，卢作孚先后发表《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社会生活和集团生活》，《一桩事业的几个要求》，《中国应该怎么办》，《如何加速国家的进步》等多篇关于现代化的论述。

^① 杜重远：《狱中杂记》，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184页。

^② 卢作孚获得“下江人”的认同，成为“楷模”：胡先骕说，“四川人太能干，太聪明了。贵省卢作孚先生，他作事负责任，有勇敢，有经验，我真佩服。……希望列位也取法他的精神和毅力，四川才有办法。”参见胡先骕：《四川农村复兴问题之讨论》（中国科学社第18次年会讲词之一），《科学》第18卷第4期，第461页，1934年4月出版。

^③ 凌耀伦认为，卢作孚是近代中国实业界中第一个明确提出“现代化”的口号、内容和目标的人物。凌耀伦：《论卢作孚的中国现代化经济思想》，杨光彦、刘重来主编：《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④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5页。

^⑤ 黄炎培在民国初年曾任江苏省教育司长，此时已经辞职，担任江苏省教育会常任干事，正大力倡导实用主义教育。通过黄炎培的介绍，对教育有浓厚兴趣的卢作孚参观了上海的一些学校和其他教育设施。见张守广编《卢作孚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页。

^⑥ 卢尔勤、卢子英：《早年的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12—114页。

^⑦ 1922年8月至1923年夏的江浙考察期间，卢作孚参观了上海中华职业教育会、中华职业学校和商务印书馆。经上海商会介绍，卢作孚还参观了上海市电力厂、锯木厂、造船厂、纺织厂等。并专门走访当时状元实业家张謇创办的全国著名的模范县——江苏南通，参观了张謇兴办的一系列近代事业。张守广编《卢作孚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⑧ 学术界通常将卢作孚的思想转变归纳为由“教育救国”转向“实业救国”。实际上，民生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训练现代人的学校。因此，截然用“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来区分卢作孚早年的教育实践和民生公司的创办是片面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卢作孚在1934年完成的《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中，将民生公司称为他现代化理想的“第三个实验”。

民生公司成为沟通重庆与外界的桥梁。“民生公司，四川新兴事业也，其力虽弱，其愿至宏，十年以来，即以辅助开发四川为职志，尤注重航业，提倡四川人士游历省外，及省外人士游历四川，盖必先求现代经营之影响深入四川，以为四川开发之先锋也。”^①因此，民生公司有响亮的口号：我们要做两个运动：欢迎省外人到四川来！促起四川人到省外去！我们帮助四川：欢迎中国科学社——科学家探索；欢迎工程师学会——工程师设计；欢迎经济学会——金融投资。我们要从外面介绍到四川来的：帮助开发四川的专门人才；帮助开发四川的经济力量。^②

沟通的目的是促使川人的觉悟，“拨开现局”看看外面世界的“另外一重天地”。^③卢作孚个人在参政期间从未中断与外界的联系，常常组团赴川外考察。据档案史料，重庆市商会专门为卢作孚游历外省归来举办个人讲演会，“此次卢作孚先生组织考察团分赴南京、苏州、无锡、淞沪、青岛、大连、旅顺、沈阳、天津、北平等地，对于国内国外工商实业精密考察，历五月余，冒暑奔驰，壮游归来，于川省建设事业多所计划”。^④

“下江人”到民生公司朝会演讲，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即表明民生公司始终与外界高水平的文化保持畅通，对于沟通川内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下江人”与重庆有着不解之缘。早在民初，长江轮船航运业的发达与沪渝贸易交流的加强，为“下江”的商人拥入川江贸易圈创造了有利条件。1936年的海关统计，重庆向上海输出的货值占了重庆全部输出货值的51%，而重庆直接从上海输入的货值占重庆全部输入货值的83.6%，^⑤这一数据显示了“下江”商人在重庆日渐成长起来的经济基础。2、30年代重庆的发展与“下江人”密不可分，开发四川的活动。重庆的发展与中央入川，“下江人”入川开发四川有很大的关系。

20年代后期开始，长江中下游的各中外轮船公司时常有轮船行驶重庆，发达的轮船航运为“下江”地区的人们进入闭塞的天府之国提供了便利，也将重庆与长江中下游各大都市联为一体。30年代初期，由于“轮船航运在长江的上游的通航，以及最近航空邮件的开通，以及长江客运业务的发展，已经使得这个省（四川）的发展加速，并且与东部发达地区的联系也得到加强”。^⑥1932年6月，民生公司开辟了重庆至上海航线，这是长江上最长的直达航班，使得重庆自开埠以来第一次与“下江”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

“黄金水道”对重庆不仅是商业贸易的流通网，也是一条涌动着的长江流域文化交流的纽带；加之30年代中期开始川局出现较为安定的局势，川江上“来往旅客日见增多，以前仅川人来往，外省者不及十分之一，今则各半”。尤其是30年代初期以重庆为中心的航空运输的出现，“自沪赴渝可以直航，自渝至蓉又有飞机可乘，故不独迅速，且甚舒适，若不观三峡风景，则乘巨机由沪至蓉，朝发夕至，几如自沪至京一游，诚缩地有方，蜀道何难矣”。^⑦“交通革命打破许多观念，飞机之促进文化与政治，殊有不可思议之威灵”，^⑧“下江人”进入四川，来自沿海的城市文明对重庆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是“下江人”首先认同了民生公司。30年代民生公司开展的客运业务，发展了长江上的旅游事业，从此揭开了封闭四川的神秘面纱。而民生轮船的服务质量更是让“下江人”赞

^① 郑璧诚：《自序》，《四川导游》，第3页，上海国光印书局1935年出版。

^② 《新世界》第89期，第18、25、34页，1936年出版。

^③ 卢作孚：《四川人的大梦其醒》（1930年1月），《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41页。

^④ 《重庆市总商会函件》，重庆市档案馆藏北碚管理局全宗卷571。

^⑤ 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丛刊第一种：《中国埠际贸易（1936—1940）》，1951年版，第14、24页。转引自沈祖炜：《近代重庆上海经济关系简析》，孟广涵主编《重庆城市史研讨会论文集》第27页，重庆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⑥ *Szechuan Decides to Stage Its Own Civil War*, i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April 11, 1931. p. 189.

^⑦ 庄泽宣：《陇蜀之游》，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9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1年版，第138—139页、166页。

^⑧ 季鸾：《入蜀记》，《国闻周报》第12卷第19期，1935年5月20日。

叹不已。1935 年冬，北京大学著名女教授陈衡哲感叹：民权轮“很不错，我们座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这是一只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船呀！”^①

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办，似乎让卢作孚找到了内陆地区现代化实现途径。通过民生的轮船，卢作孚再次以其独特的视野和大胆的设计，精心规划出了“北碚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当重庆地区中国共产党活动遭到严酷打击的同时，刘湘对于体制内成长起来的温和的变革力量，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②

北碚原属于巴县，位于江巴璧合四县之间。因为盗匪出没，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以资镇压。1927 年卢作孚接长峡防局。从本质上看，“北碚模式”是试图突破四川军阀防区制而演变出来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用卢作孚的话，“我们凭借了一个团务机关——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局团务局，凭借局里训练了几队士兵，先后训练了几队学生，在那里选择了几个点——北碚、夏溪口以至于矿山北川铁路沿线——试作一种乡村运动”，其目的“就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③这也是卢作孚现代化理念中的“第二个实验”，卢作孚说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区域所形成的是一种“理想”，“是要想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④

在卢作孚的现代化理想中，“北碚模式”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吸引新的经济事业。相继投资和参与兴办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促成洪济造冰厂利用水力；第二是创造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创办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嘉陵江日报馆、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及其附属小学校、各类民众学校等。

北碚的建设经费是困难的，作为 21 军防区中的一块地盘，它最初的经费来自 21 军。^⑤尽管卢作孚“力谋生产事业之扩充”来支持北碚的各项文化建设，不过仍然是“经费日益不敷”，从卢作孚在上海采购三峡染织厂的新式机器的困窘状况可知，北碚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尚未完全“自给自足”而独立于防区制之外。^⑥出川考察期间，卢作孚“深感峡局之事业要图巩固，只有自造生产事业”^⑦。

从卢作孚《东北游记》看，“北碚模式”的思路似乎揉和了上海的现代工业技术，德国建设青岛城市经验，日本建设大连的经验，以及张謇建设南通的经验。30 年代初，卢作孚率团考察江浙和东北各省，这是北碚与外界沟通与交流的开始。走出四川，意味着“北碚模式”可以突破地域局限，或者说可以突破 21 军防区政体。卢作孚沿途走访、拜见的人物均为民国时期政界、学界以及在野名流，这也是最初认同“北碚模式”的人群，其相当一部分是“下江人”。在卢作孚北碚建设的事业中，“下江人”的参与和卢作孚有意借用“下江人”资源，意义是深远的。

“北碚模式”归根到底是一种“社会动员”的方式。从现代化的层面看，社会动员是一个过程，它意味著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方面和传统社会的人们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这就是扫盲、教育、更大范围的交际、大众媒介和都市化的结果。^⑧在北碚

^① 陈衡哲：《川行琐记（一）》，《独立评论》第 190 期，1935 年 3 月出版。

^② 刘湘曾表明他试图借鉴北碚建设的经验。在参观北碚峡防局建设后，他说来北碚是“想找朋友解决教建两问题”，这两个问题让他思考了两年，而不能解决。而参观北碚却找到了两年未曾解决的“答案”。刘湘，《刘甫澄在峡防局演讲》，《嘉陵江日报》，1931 年 9 月 1 日。

^③ 卢作孚：《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建设运动》，《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53 页。

^④ 卢作孚：《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1934 年 8 月 2 日），《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35-336 页。

^⑤ 1930 年 6 月卢作孚致熊明甫等，指示熊明甫“亲见刘湘，面陈北碚峡防局的种种困境”，向刘湘“商借预支补助费”。见《卢作孚致熊明甫等函》（1930 年 6 月 18 日），重庆市档案馆藏北碚管理局全宗峡防局类 368 卷。

^⑥ 《卢作孚致刘湘函》，重庆市档案馆藏北碚管理局全宗峡防局类第 348 卷。

^⑦ 《三峡染织厂业务概况》，《嘉陵江日报》1931 年 1 月 22 日。

^⑧ 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 年版，1996 年第

的社会动员中，卢作孚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方式——现代传媒《嘉陵江》^①。这份小小的日报，文字通俗、明白、简练，却刊载了现代的国防、交通、产业、文化各种消息。办报的人也只有一、二个，每天却有专人把报送到各乡，并张贴在码头、民众会场、渡船及所有的公共场所，让人阅读。^②小报尽管“白话字句很浅，只要读过一两年书的都可以看”^③，但所传播的信息和产生的影响则是巨大的。正如《嘉陵江》报发刊词所语“盼望这个小报传播出去，同嘉陵江那条河流一样广大，至少流到太平洋”，从小小的《嘉陵江》报，可以“看穿四川、中国乃至五大洲——全世界”。^④1928年9月卢作孚在北碚创办《新生命》画报，对不识字的平民施行教育。^⑤在北碚许多地方建设事业和民众的教育工作，大都是从民间的生活习俗和特殊的风俗中开展起来。北碚的“夏节”就是学校的学生、工厂的工人、北碚的市民欢天喜地的盼望着的节日。夏节期间，民生公司建造的电车、飞机和轮船等内陆地区人们很难见着的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模型，配以详细的解说。兼善中学内的科学展览，有机械农具、农产品和动物标本、书画，让人流连忘返。人们不仅踊跃参加活动，且整个北碚的空气“简直是被一种新的精神燃烧着，充满了动的活力”。^⑥

和潘文华在重庆的建设比较，北碚确实呈现出不同的景观：首先是北碚各事业机关的环境是崭新的，在这里几乎很难看到重庆那样的“小上海”式的洋楼、饭馆、舞厅、影院等等，但“办公室布置得十分整齐，地面亦清洁非常，墙壁上都挂上了一幅两幅教育或新智识的图画，及一般民众生活上有关系的表图。每个机关门首当眼处，都张贴着一张该事业机关的概况，使人一望而知其一切内容”，即使是寝室、厨房、厕所，也都清洁、整齐、简朴，任人参观。市街上的食店、客栈的布置也以“新”感人。^⑦在北碚，最现代的高层建筑是中国西部科学院科学大楼和兼善中学等文化教学设施。1930年卢作孚在北碚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这是继中央研究院（1928年），北平研究院（1929年）之后，我国首创的一所民办科学院。西部科学院设有生物、地质、农林和理化等4个研究所，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科研机构。^⑧

“北碚模式”的特色在以“精神”和“人的现代训练”。^⑨1934年，峡防局积极筹建“六省旅行团”（鄂赣江浙鲁豫六省），主要目标是促成峡区人民的觉悟，启迪峡区人民的现代意识。因为“周览国内名城，方于现代社会有所认识”，对于“都市文明”的认识。^⑩从这个意义看，北碚人比重庆人更具开阔的视野。和重庆人不同，走出去的北碚人更愿意从上海采购现代化的机器，搜集有关农业科技、天文、西湖风光、各省风景以及欧洲大战的状况的幻灯片，作为平民娱乐的教育资料。^⑪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距离重庆不过几十公里的北碚给

3次印刷，第31页。

^① 1928年3月4日，卢作孚改组《学生周刊》，创办3日刊《嘉陵江》报，不久改为两日刊。1931年1月起，改为日刊，即《嘉陵江日报》。

^② 赵晓铃：《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③ 卢作孚：《介绍嘉陵江》、《请看嘉陵江六大特色》，《嘉陵江》，1928年3月4日。

^④ 《发刊词》，《嘉陵江》，1928年3月4日。

^⑤ 张守广编《卢作孚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⑥ 雪西：《北碚的夏节》，《工作月刊》第1卷1期，1936年7月1日，第80—83页。

^⑦ 雪西：《北碚的夏节》，《工作月刊》第1卷1期，1936年7月1日，第82页。

^⑧ 西部科学院最初的人才还有“归国留学人员”《静生物调查所秉志关于推荐西部科学院人选致卢作孚函》（1933年6月24日），重庆市档案馆藏西部科学院全宗0112/13卷13。

^⑨ 《嘉陵江日报》上有关北碚建设的简陋状况的描述，表明北碚所追求的并非是物质层面的内涵。作为北碚建设的亲历者，卢作孚的次子卢国纪先生回忆北碚建设改变了北碚人传统的“赌博”、“鸦片”、“看戏”的生活习气，新北碚的民众被动员起来，关心社会，过着新的生活。（卢国纪在民生实业有限公司“纪念卢作孚逝世五十周年座谈会”上谈话，2002年2月8日。）

^⑩ 《峡区继续筹备之中的六省旅行团》，《嘉陵江日报》1934年5月26日。

^⑪ 《平民娱乐场由沪带回幻灯片》，《嘉陵江日报》1931年11月7日。我们从30年代初卢作孚上海、江浙之行考察的记录看，他“竭力留意生产事业”，组织人员考察大、小工厂，学习技术，采购样本。派出人员在上海学习的是“织袜、织布、制标本、染织等技术”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局团务档008/1/368，

人的印象是“安宁、整洁、进步和人的精神振奋”。^①如果说刘湘 21 军停留在模仿“上海模式”物化的层面，卢作孚的“北碚模式”则是从人的现代化的层面突破了纯粹追赶上海的误区。

北碚始终朝着建立“一个大众公共享受的城市”目标努力。以群众性体育活动为例，1928 年北碚建立的民众体育场，面积 13952 平方米，有足球场一个，篮球场一个，器械场一个，还有沙坑。以后又扩建了一个篮球场，两个网球场。1929 年 4 月 20 日至 26 日，四川近代体育史上规模最大、参加面最广的运动会在北碚民众体育场召开，重庆及江、巴、璧、合及北碚 38 个单位、社会团体的 116 名运动员参加。1930 年，峡防局聘请江苏成烈体育专科学校的李治臣、邓步宫为北碚体育场体育指导员，提高此间的运动水平。^②与此同时，小小的北碚注重绿化建设，郁郁葱葱的杨槐、伞状的法国梧桐、以及随风飘扬的杨柳成为北碚城的重要标志。因此，这里看不到上海、重庆“丢掉广大的农村、山林、河流，几乎没有城市公共事业。只有极少数人那能够享受繁荣的‘畸形的资本主义的建设’”^③。

三、对“军人干政”的冲击

如果说，民生公司从川江航运的商贸层面构架起重庆与外界交往的桥梁，实现了传统社会的开放态势；北碚则是卢作孚精心构筑的一个与“下江人”直接接轨的舞台。对这个“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重庆人与“下江人”都赞叹不已。“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参谋团畅游北碚后感叹：“今则北碚不仅有大自然的美，且已用人力去改造过一番，因峡区各事业，都是现代化、组织化，艺术化，在最近将来不仅望北碚事业这样，还望四川建设都这样”^④。他们甚至认为北碚并不比江苏的南通和无锡落后。^⑤这个被称为“川中之洞天福地”，“世外桃源”^⑥，其精神建设大于物质建设。^⑦张公权在 1934 年游历四川后，大加赞赏卢作孚是致力于四川革新的有志之士，其苦心从事的社会工作乃“努力精神建设”。^⑧黄炎培说“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与其说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⑨美国《亚洲》撰文称赞“北碚是至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中最为杰出的典型。”^⑩1932 年太虚大师参观北碚，感叹北碚在几年间由一个从前人们不能安居，外地人也视为畏途的恐怖区域，变成一个勃勃生气，有种种新事业的建设区。并以“建设人间净土”为题，对峡区青年演讲，他高度赞扬卢作孚领导的北碚建设，认为北碚的成就证明佛法上所谓净土之意，不必定在人间之外，人间亦可造成净土。¹¹对于外省人而言，在旅游业中崛起的北碚，几乎是四川省“现代化”的代名词。¹²

《卢作孚致熊明甫函》（1930 年 4 月 16 日），转引自张守广编《卢作孚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58 页。

^① 赵晓铃：《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7—8 页。

^② 赵晓铃：《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58—60 页。

^③ 金满成：《重庆的前途，上海的后影》（四），《新蜀报副刊》第 38 期，1932 年 6 月 23 日。

^④ 《中央行营参谋团第一批来北碚参观》，《嘉陵江日报》1935 年 2 月 21 日。

^⑤ 《嘉陵江日报》1935 年 2 月 23 日。

^⑥ 《随张公权来川之张肖梅谈考察观感（续）》，《商务日报》1934 年 6 月 21 日。另据贺伯辛：《八省旅行见闻》记载，“近五年来，北碚及温泉之胜，同时脍炙人口。各地来此游人，几无日无之”，“北碚印象，街市清洁，秩序井然。至公务人员之生气勃勃，市民之努力工作，皆极堪钦佩。”见《八省旅行见闻录》第 8，10 页。

^⑦ 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杨先中称赞北碚精神上的建设比江苏南通更加完备，见《北碚富于精神建设》，《嘉陵江日报》1933 年 8 月 27 日。

^⑧ 《张公权畅游四川感想》，《商务日报》1934 年 6 月 19 日。

^⑨ 黄炎培：《蜀道》，上海开明书店，1935 年版，第 114 页。

^⑩ T.H. Sun, “Lu Tso-fu and His Yangtze Fleet”, in *Asia*, (June 1944): 248

¹¹ 赵晓铃：《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33-134 页。

¹² 中国科学社 1933 年赴北碚开会，称赞“北碚本一小村落，自卢氏经营后，文化发展，市政毕举，实国内

通过旅游，北碚聚集起来的“下江人”队伍既庞大，地位又显赫。北碚因为“下江人”逐步成为全国传媒的焦点，“下江人”也借助北碚率先成长为影响后方社会的重要群体。北碚聚集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说北碚动员了国内的人才也不过分。卢作孚为事业寻找人才，曾访遍省内，国内，甚至国外，如聘请德国人傅德利为昆虫研究员，聘请胶济铁路总工程师徐利氏为北川铁路工程师，后改聘丹麦人守儿慈为北川铁路总工程师。^①卢作孚作为四川省建设厅长，也频繁往来与重庆与“下江”之间，接洽沪银行组织银团入川投资事宜，“沪各大银行当局，对入川投资极表同情”。^②

亨廷顿指出，“当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能力，当他们开始认为自己能够理解并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然和社会之时，现代性才开始。现代化首先在于坚信人有能力通过理性行为去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③按照卢作孚理想，是要把“在今天，中国学术上、教育上、有地位、有声誉的人来替我们把四川近年的真相介绍出去，使外间的人了解我们四川内部的真情实况，不像今天以前的外间的人都怀疑四川，提起四川的问题都漠不关心。今天以后，不单是要外间的人都明了四川的真相，而且要使外间的人都以技术的力量或经济的力量来帮助四川，以促成四川的各种实业的经营，这是今天以外要把外间的人向来对于四川的观念根本转变过来的”。他主张“用力运动外省人都到四川来”，“以成群的集团力量帮助四川”，“拼命运动，白日不够继之以夜”，他要实现把“四川造成租界吸引世界上的人和钱”，以期将“魔窟”变为“桃源”，把“天府”造成“天国”^④。

北碚人的生活冲击着大重庆。^⑤重庆的传媒上大幅广告登载民生公司轮船航班的广告“好消息”，北碚是理想的观光、休闲场所。北碚的“三峡布短服”风行重庆。到过北碚的重庆人开始感悟，北碚是“人中的”社会，是“具有生命要素的社会”，是“流动的社会”。^⑥甚至，北碚建设成了周边各县市政建设的“样板”，江北“改革地方一切事业大致都要仿照北碚”^⑦。

北碚建设对 21 军集团的影响是深远的。1935 年，四川省新政府成立，刘湘决心提倡以重庆和成都作为建设的“模范区”，希望“给一般人看看，使他们信仰，使他们效仿”^⑧，这或许是“北碚模式”的刺激作用。范崇实给卢作孚的信中对北碚同人深表“感佩”，并希望社会上“还有一群人，照这样积极行动”，“希望各方面的朋友，多方赞助这群人的积极行动，多方提倡，多方影响，以共收鸣交响之效果”，甚至表示“准备将来要加入你们这群人”！^⑨不少 21 军的军人慷慨解囊，支持北碚建设。他们频繁参观北碚建设的成就，试图从北碚模式中寻求建设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寻求“军人干政”的合法性资源。因为这一时期，外间对于川军的批评多半将之与北碚作明显的对比，如果都能够像北碚一样，岂不可以逃脱中央批评的话语？^⑩刘湘说：“峡防局像一股清泉”，处处体现了“我”的特色，并非“西洋式徒

一模范村也。”《中国科学社第 18 次年会纪事》，《科学》第 18 卷第 1 期，第 133 页。

① 高孟先：《卢作孚与北碚建设》，《文史资料选辑》第 74 辑，第 97 页。

② 《新新新闻》，1937 年 1 月 12 日。

③ 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 92 页。

④ 卢作孚：《中国科学社来四川开年会以后》（1933 年 10 月），《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42—243 页、249 页。

⑤ 参观北碚后的重庆绅商慨叹“繁华的重庆反不如一个乡村的建设”，《一批重庆绅商来峡参观》，《嘉陵江日报》1931 年 7 月 22 日。

⑥ 《峡局是富于生命的社会》，《商务日报》1933 年 1 月 31 日。

⑦ 《静观镇模仿北碚》，《嘉陵江日报》1931 年 9 月 23 日。

⑧ 刘湘演讲词，《四川省政府公报》第 26 期，第 27 期，1935 年 11 月 11 日出版。

⑨ 范崇实：《响应》（致卢作孚），《新世界》第 59 卷，第 70 页，1934 年 12 月 1 日出版。

⑩ 21 军因“新”北碚的出现逐渐改变了在全国公众的形象，北碚为刘湘的“军人干政”增添了若干合法性资源。1933 年 1 月 30 日上海记者团抵渝，参观北碚是重要的活动。

供消耗奢侈的洋八股”。^①

作为重庆的乡村，作为 21 军的防区，北碚本该同一切重庆的周边一样贫穷不堪和难民成群；作乡村，北碚也本该同重庆周边乡村一样向往重庆的繁华都市生活和在重庆的“现代化”辐射下逐渐趋同于重庆的“小上海”模式，但是，北碚却实实在在地实践着另外一种现代化的理念。尤其可贵的是，在刘湘制造“三·三一”事件，当军阀政治的防区体制下革命话语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受挫时，卢作孚以其坚韧的毅力和独特的“开发与发展”的商业运作方式从事现代化的建设，沟通了重庆与外界，从根基上解构了“军人干政”的体制。

Lu Zuofu's "Beibei Model" and Urban Changes in Chongqing in the 1920 -30s

ZHANG Ji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connections between Lu Zuofu's "Beibei Model" and urban changes in Chongqing in the 1920 – 30s from a socio-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archival documents, local chronicles and mass media in order to provide an inland case for modern Chinese urban history studies. First, it draws a real picture of changing urban life in Chongqing, the largest inland trading port in China in the 1920 – 30s, to show how this inland "little Shanghai" followed Shanghai in a enclosed system of "military interfered government" that couldn't resist the temptation of "Shanghai Model" and that all the reforms done by the military interfered government were to enforce the garrison area. Second, Lu Zuofu and his "Beibei Model" in practice were explored to reveal a different modern life, "Beibei Model", derived from "military interfered government" and "radiated" in Chongqing to certain extent as an important "window" of the enclosed area to the outside world. Third, Urban life in Chongqing at that time had a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formation as a complex of new and old elements in the trend that Lu's "Beibei Model" was to replace the honorable "Little Shanghai" in Chongqing.

Keywords: Lu Zuofu; "Beibei Model"; Chongqing; Modern Chinese Urban History

收稿日期: 2005-05-30

作者简介: 张瑾，女，历史学博士，重庆医科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

^① 《刘甫澄军长在峡防局演讲》，《嘉陵江日报》1931 年 9 月 1 日。